

[法] A.J. 格雷马斯 / 著
吴泓缈 冯学俊 / 译

Du Sens Essais sémiotiques

Tome 1

论意义 符号学论文集

上册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青院 11 000663040

[法] A.J. 格雷马斯 / 著
吴泓缈 冯学俊 / 译

Du Sens Essais sémiotiques

Tome 1

论意义 符号学论文集

上册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 / (法) 格雷马斯著；吴泓
缈，冯学俊译。-- 2版。--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5

(新世纪人文译丛)

ISBN 978-7-5306-5954-0

I. ①论… II. ①格… ②吴… ③冯… III. ①符号学
—文集 IV. ①HO-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3617号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qui mérite d’être vivement remercié
par Editeur et traducteurs du présent ouvrage

本书出版承蒙法国外交部赞助，
特此致谢！

Du Sens
Essais sémiotiques. Tome 1
Algirdas Julien GREIMAS
© Editions du Seuil, 1970.

Du Sens
Essais sémiotiques. Tome 2
Algirdas Julien GREIMAS
© Editions du Seuil, 1983.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2-2005-14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8.375 插页4 字数413千字
2005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2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每套定价：37.00元

目 录

意 义

论意义	3
关于语言的思考	15
1, 引言	15
2, 语言学理论与语义世界	17
3, 纵聚合轴模型	23
4, 横组合模型	30
5, 结论	34
语义结构	36
1, 语义结构和语义域	36
2, 语义结构是一个组合体	37
3, 符号学形式和科学形式	39
4, 横向与纵向代码转换	40
5, 从表达到内容	42
6, 语言的普遍现象	44
一门关于自然界的符号学的条件	46
1, 引言	46
2, 自然界及其意义	50

3, 天然的动作和文化动作	54
4, 动作实践	60
5, 动作交流	68
6, 符号关系 (sémiosis)	80
建立一门常识社会学	90
1, 外延与内涵	90
2, 内涵系统	91
3, 内涵域	93
4, 符号对象的“真相”(être) 与“幻象”(paraître)	96
5, 亲身经历之社会现实	97
6, 必要的扩展	99

历史与比较

结构与历史	103
历史与常态	103
时间长度与结构层次	105
共时性与历时性	107
结构的历史化	108
结构与实际用法	111
结构的转化	112
历时性转化	114
比较神话学	116
神话与社会契约	119
善与恶的神话	123
关于过度的神话	126

神话叙事还是礼仪叙事?	131
符号学约束规则之戏法.....	139
1,整合式模型的结构.....	140
2,内容的赋值.....	147
3,走向意义的实现.....	156

叙 事

叙述语法的成分.....	165
1,叙述性与符号学理论.....	165
2,深层语法的成分.....	170
3,表层叙述语法的成分.....	174
建立一门阐释神话叙事的理论.....	193
1,语义理论和神话学.....	193
2,神话的结构组成.....	194
3,叙述信息.....	205
4,结构性信息.....	222
5,信息的结构.....	241
找“怕”	242
导言.....	242
1,叙述结构.....	243
2,神话世界.....	249
3,结局.....	256
叙事的行动元结构.....	260
生成方法研究.....	260
1,先期研究.....	260

2,人物.....	265
3,发讯者问题.....	269
4,奸徒问题.....	271

显 现

结构语言学与诗学.....	285
1,诗歌的特殊性.....	285
2,诗学交流.....	287
3,表达与内容的关联关系.....	291
4,诗歌对象.....	293
5,诗歌的愉悦.....	296
书写填字游戏.....	297
1,交流与中介.....	297
2,句法上的距离.....	301
3,语义上的距离与等值.....	311
4,结语.....	320
成语与谚语.....	321

意 义

论 意 义

要谈论意义并谈出点有意义的东西来简直比登天还难。谈论意义唯一合适的方式就是建构一种不表达任何意义的语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段客观化距离，可以用不带意义的话语来谈论有意义的话语。

这正是逻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他们甚至发明了“脱去意义的”这种说法来表达某类词语的特点，并借助这类词语来讨论其他词语。可惜的是，“脱去意义的”说法并非没有意义，它们甚至是各派荒诞哲学之源。它们所涵盖的词语同样也不是毫无意义的：试问“和”与“或”还有“如果”是什么意思，我们虽然用“合取”、“析取”和“条件”取代了它们，但我们只不过像字典中那样在不断地重叠与罗列，用同义词和定义去取代另一些同义词和定义，一个没有终结的循环。

毫无疑问，人总有办法停止在某个元语言层面上，告诫自己不要再继续深究下去，对那些留存下来的基本概念不予定义，立即着手严肃的工作，也就是说开始建立公理体系。唯有借助公理体系我们才有可能层层深入，最后触摸到单词的意思，触摸到单词搭配对我们生出的效应。这可能是最明智的办法，但它同时也说明了我们的无能。

为了暂时摆脱无处不在的意义，我们可以对问题换一种提

法。一首诗或一幅画不过是一种凭借，它们所含有的意义只能是我们赋予的。于是“我们”成了意义的最高决策者，正是这个“我们”确定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文化过滤系统，并在特殊对象——纵横交错之能指所形成的结果：油画、诗歌、故事——中选择和排列“隐性”的认知范式。上述操作获得了成功，意义从能指对象中被剥离出来，相对主义大获全胜：此地并无单一义，任何意义都是可能的。事实上，一切依旧，带着它原有的认知分类和原有的句法组合，同一问题被原原本本地转移到了一个更“深”的或仅仅是不同的层次上。无论您把意义放在词的背后，还是放在它们现身之前或之后，意义问题依旧完整如故。

不久前乃至今天人们还一直以为自己可以摆脱这一困境，可以照索绪尔那样断言单词没有意义，那其间有的只是对立与关系，各单词受关系与对立的摆布，只是在表面上拥有了某种意义。无奈的是，被剥夺了意义的单词把意义又转让给了关系，而关系依旧在表意。不错，关系表意不那么直观，而且更加灵活，它还导致人们重新引入那著名的动力论，可这个动力论却常常演变成滥用方法和信口雌黄。一个巨大的障碍始终竖立在那里：我们早晚要进入话语的封闭世界，这个封闭世界使得我们只要开口谈论关系，关系它摇身一变就成了名词，也就是说成了一个我们必须否认其意义的术语，我们必须为它设计新的关系，周而复始，以至无穷。人类能够想象出来的任何一门元语言都不仅是表意的语言，而且也是在进行着名词化的语言，它会把所有的意愿冲动都凝固成概念性术语。

结果我们会说，我们的先辈大概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幼稚，他们曾宣称——比如说布龙菲尔德——意义的存在毋庸置疑，它是一个直观的数据，除此之外无可奉告。他们至少有以下

功劳：致力于研究意义的显现条件，也就是说致力于描写包裹意义的声音或图像外壳——外壳与意义固然无关，但意义必须透过它们传递给我们——他们把意义问题简化到一个更容易接近的层面上。如果说他们壮志未酬，那部分原因是他们对自己在能指分析中获得的成果感到满意，于是转向猛攻词素（morphème），亦即符号，自以为借助于形式化方法他们能瞒天过海，在意义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从一个层次跳到另一个层次，从意义这边过渡到各种意义的分布（distribution des significations）上去。他们至少留给了我们一个“反向义”（sens négatif）的概念，让我们有可能说 *pas*（“不”）绝非 *bas*（“下”），二者之间有着意义上的“间距”（écart）。

这样一来，为避开意义而做的大量工作就不仅证明了自身的必要性，而且还向我们展示了一层新义：对语义学而言，能指层面上的各种被称为描写的和发现的方法变成了验证之法，在描写意义的同时我们必须使用之。如果说能指层面上的每一点变化都显示出意义上的某种变化，那么反之，能指层面上倘若没有出现能够确认的间距，我们就不应该录下任何意义变化。

但也不应抱太大幻想：就意义而言，这些方法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它们仅仅在语言的两个独立层面之间建立了一种关联性的互控关系。如果说关于意义的描写是抽象的，那么上述的控制方法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它们的内在一致性。大家知道，人类想象出来的真理标准极少，而一致性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更方便地思考这种“区别性间距”（écart différentiel），假定我们进入到形象世界，想象眼前立着一块烟雾屏幕——意义世界屏幕上罩着一层不易察觉的蜘蛛网，构成蜘蛛网的是千

万个纵横交错的区别性间距：这就是索绪尔的语言观。我们的直观感觉——有色彩、重量、固定形状的世界——与此类网格子显然不是一回事，因为区别性间距不会直接呈现在这种“物质实体”中，它们仅仅是结果，一个世界中的非连续性被感知的结果。对这个世界，我们一无所知。构成上述间距的正是事物的种种可比较方面之间的关系和差异。

只要大家承认这种感知在逻辑上早于被认出的间距，并从中得出结论——比方说：能指的物质实体仅仅是一个凭借，它帮助我们感知意义，上述的感知给物质实体“赋予信息”；能指的形式，即全部间距，作为一种分节，是感知操作的结果——曾被我们理智地摆在能指和非意义层面上的关于表意之条件的问题，在意义涌现的心脏部位又冒了出来。要知道，能指的构造问题就已经是一个意义问题了。即便那令人安心的反向义概念，也不见得比不久前追求形式化的结构主义者们想象出来的所有方法更合情合理。

真正令人窘迫的不是对意义之源的回溯，而是以下事实：对感知意义——或曰产生意义、生成意义——的基本条件的任何思考都必然会涉及到认识论方面的一些非常普遍的概念，例如同与异、是与否、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实体（物质实体）等等。结果我们又身不由己地一头栽进了“永恒的哲学”；在这条道上继续走下去，我们很有可能从语言学者——干这一行我们多少还有点把握——变成二流哲学家。事实上，研究各种认知理论的基础，我们会发现一系列基本概念；在创建形式语言（逻辑与数学）时，人们使用了各种公理系统；我们若想思考意义显现的必要条件，首先必须阐明和学会摆弄以上所有的概念和公理系统。

在认识论的大合唱中，符号学家的嗓音可能小得微不足道，

但这理由足以让我们把定义语义学的重任推给旁人吗？

哲学家的第一要务是理解，在意义上为自己建造一篇话语，其话语就像是与这世界同位的(isotopie^①)一个巨大隐喻。哲学家在本质上是静观型的。误会便由此而生。当符号学家发现不得不让自己的思考延伸到在传统上原本属于哲学的领域时，他只好勉为其难：符号学家其实宁愿躲在匿名话语和技术术语的屏风之后。这是一句老套的反话，不过在他的态度中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基础理论思考必须具有科学实用价值，否则这思考没有意义。知是为了用，用是目的。因此，符号学家在借用旁人观点时从不感到难堪，二手货也具有启发教益的作用：重温索绪尔或叶姆斯列夫理论的哲学来源，那里边就几乎无所不包。对符号学家而言，最重要的是让这些观点与他心中的本学科现状不发生矛盾，而且他还殷切地要求这些观点能够“咬住现实”：所谓原始民族，他们也有语言哲学，不比我们的差，只是没有进化成语言学罢了。

符号学家对形式语言的态度基本上是怀疑加欣赏。他受到象征逻辑的吸引：那便是他想要的，对于他自己的操作概念和简化为简单算式的关系，他希望赋予同样的形式。然而，逻辑计算的重言式特征让他感到困扰：他自问所有的代码转换，所有对意义的新分解(articulation)是不是都加大了意义，或至少与原意有一定出入，一种必须记录在案的出入。关于真、假的模态也让他感到困惑，特别是此类模态参照的现实并不是语言现实，如果不事先赋予此类现实一个符号学身份，他的语言观禁止他对它

① “同位”一般被看作一个丛集，由一篇话语暗含的多余语义类别所构成。两篇话语有可能是同位的，但却不会是同构的。

进行思考。他需要一个语言逻辑，该逻辑应能在处理真、假的同一层面上处理谎言与秘密、狡猾与诚实。他更需要的是等值 (*équivalences*) 逻辑而不是同一 (*identités*) 逻辑。

数理逻辑模型昔日的荣光和近日的成功一直在吸引着符号学家。我们所指的当然不是数理模型在统计计算上的种种应用，这浅薄的时髦已经过时，我们指的是数量与日俱增的形式模型，为建构语法和语言它们提供了大量现成的技术和模具。让符号学家茫然失措的与其说是模型的数量，还不如说是与它们的应用联系在一起的主观武断的实用主义态度。这一切自然与数学家无关：数学家在形式语言的层次上操作，他只是为大家提供一张可能出现的不同模型的清单。如何挑选，那是符号学家的事。然而，在所谓精确科学的学科中，上述挑选发生在日积月累的知识所形成的约束网内，并受到了科学应用之实效的检验；在正在形成的年轻学科中，被选中的模型不仅时刻威胁着其作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理论的经济平衡，而且还会根据自身的形象塑造和改造后者脆弱的知识储存。一门学科的成熟程度——难以确定的标准——在此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样的模型，对一门成熟的科学学科来说它们可能是约束性的，但对一门还在追求科学性的学科来说，它们很可能是牵强的。对前后两种情况而言，模型是否合适的问题的提法是不一样的。

通过一扇窄门，在两个毋庸置疑的能力——哲学与数理逻辑的能力——之间，符号学家进行着他关于意义的调研。他的目的当然不是按哲学家的方式去建立一门语义学：有多少这样建立起来的学科其寿命短暂如玫瑰。其目的更不是发展出一套关于意义的元话语：关于“结构主义”的散文式的和哲学式的议论与人文科学中所应用的结构方法混淆不清，已经造成了太多

的危害。为了满足符号学的实际需要,我们必须拥有最少量的几个认识论概念,它们不仅得到了阐明,而且,在符号学家分析意义时,在别人向他提供模型或他为自己创建模型时,这有数的几个概念还能够帮助他识辨模型的适宜度。符号学家的方法需要从认识论上加以监控。

人生活在有意义的世界里。对人而言,意义问题不成其为问题,意义明摆在那里,显而易见,自然而然我们就“懂了”。好比一个“白色的”世界,在其中语言是事物和动作的纯粹标记,人们不可能对意义发问:所有的发问都是元语言。

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那又是想说什么意思?通讯管道的两头冒出人形的隐喻,依靠这些隐喻,人天真地探询着意义,仿佛单词真的会有意思,仿佛支起耳朵就能听见意思。回答来了,可仅仅是代理人的回答,充满了歧义:那永远是一些转换的说法,一些或忠实或不忠实的转译,用一些陈述(*énoncé*)和单词去取代另一些陈述和单词。

表意不过是从一门语言到另一门不同的语言、从语言的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的转换,意义便是这种置换代码的可能性。

夸张一点,我们甚至说人们发表的元语言学性质的言论不过是一串串谎言,人际交流不过是一系列误解。至于书写,它理所当然是背叛。文学批评至多算是比喻性的自由翻译,一种并非原创性的符号学活动。关于这类主题的各式各样的文学题材我们屡见不鲜,为了写出书写之荒诞之狂妄之不可能,人们给自己找了多少借口……

令人惊讶的是,当文学专心于自揭其短的时候,一个共时的、平行的、以翻译社会无意识之意义为己任的符号学活动却在

非神秘化的名义下为人称道。在个人层面上作为谎言和痛苦之源的东西，在社会层面上化为真理与解放。

至于符号学家，他时而担心自己的研究被用来为意识形态服务，时而又为这些研究有用武之地感到得意，谎言与真理，其实是一体。问题并不在此，用他的行话讲，这样提问题不妥当。对意义进行译码的元语言活动可以是道德的也可以是不道德的，它可以让人感到欣慰也可以让人感到不舒服，我们只需见证并记住这些现象，把它们放到关于内容问题的研究中去，内容在元语言操作中被赋值，元语言操作的存在方式是公理性的。符号学家至多可以补充说——像那个促销香皂的广告社会学家一样——通过对译码过程进行描述和客观化，他锻造了一件属于未来的武器，像所有武器一样，该武器有可能为英雄所用也有可能落入奸贼之手。他将牢记另一个他认为是基本的现实：自然语言从来就不是指事性的，而是多面性的，时刻生活在比喻的威胁下是一种正常状态，是“人类的处境”^①之一。

如果把意义问题简化到最低限度，也就是说简化为关于意义的译码，如果说这种转译在自然地进行，但进行得很不好，那么人们会问，在这方面的科学活动是不是就是设计转译技术，转译技术将允许我们进行人工译码，但却是很好的译码。因此，关于意义的符号学描写就是建构一门具有一致性的人工语。如果我们大致上知道如何建构一门人工语——每年人们都会弄出几百种人工语——那么，一致性问题，也就是说在人工语言和自然语言之间建立等值系统的问题，能否得到圆满的解决，将是判断我们事业成功与否的唯一条件。我们在不同的道路上绕了一

① 此处影射马尔罗的小说《人类的处境》。——译注